

再看“曹丕的一个时代”

张宏伟*·李爽炯**

<目次>

- | | |
|------------------|----------------|
| I. 绪论 | III. 再看曹丕时代的文学 |
| II. 鲁迅“文学自觉说”之探讨 | 1. 由“言志”到“抒情” |
| 1. 所谓源自西方的“文学自觉” | 2. 由“奴性”到“人性” |
| 2. 鲁迅的“文学自觉说” | 3. 由“附庸”到“独立” |
| | IV. 结论 |

I. 绪论

1927年7月鲁迅先生在广州的演讲中提出：“他(案：指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¹⁾此后“文学自觉”成为学术界概括建安文学特征时必引用和提及的词语，之后这个概念被引申发展为“魏晋文学自觉说”²⁾，即文学自觉始于魏晋，

* 中央大学校 大学院 东北亚学科 中国语文学专业 博士班

** 中央大学校 Asia文化学部 中国语文学专攻 教授

1) 鲁迅，《鲁迅全集》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490-491页。

2) 持此观点的代表学者和著作主要有：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郭少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2，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并且成为一种定论，一直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但是近几年来，对此说法存疑的越来越多，开始出现了别家说法，其中最有力的是“汉代文学自觉说”³⁾和“宋齐文学自觉说”⁴⁾，另外还有先秦文学自觉说⁵⁾，汉末魏初文学自觉说⁶⁾等多种说法。还有一些学者不太赞成用“文学自觉”这一词语来概括汉魏以来文学的发展变化，因为“文学自觉”这个论断内涵有限，歧义性太大。中国文学有自身的发展过程，不能用源自于西方的“文学自觉”这样的概念来生搬硬套。⁷⁾统观学术界关于“文学自觉说”的各持己见，笔者认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脱离了鲁迅的原意，没有从鲁迅的原话出发，按自己的理解给“文学自觉”进行定义，制定标准，然后给出说法，比如把“文学自觉”理解为“人的自觉”、“文学审美标准的提出”、“文体的自觉”以及“文学作品的抒情化”等等。因此，造成了“文学自觉说”的各种版本，使我们在理解建安文学及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时产生困惑。为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从鲁迅的原话出发，结合当时提出此观点时的时代背景，对“文学自觉”进行重新认识，理解鲁迅所谓的“文学自觉”究竟是什么含义。

本文准备考察“文学自觉”说的具体含义，而为了弄清楚这个所谓源自西方的文学概念，首先要考察“为艺术而艺术”源出于哪个学派，具体含义是什么。然后，从鲁迅的原话出发，重新探讨“文学自觉”的确切含义。之后再结

-
- 3) 持此观点的代表学者和论著主要有：龚克昌，〈汉赋论〉，《文史哲》第1期，1981；龚克昌，〈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文史哲》第5期，1988；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1996；詹福瑞，〈文士，经生的文士化与文学的自觉〉，《河北学刊》第4期，1998；詹福瑞，〈从汉代人对屈原的批评看汉代文学的自觉〉，《文艺理论研究》第5期，2000；李炳海，〈黄钟大吕之音—古代辞赋的文本阐释〉，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16页；刘欢，〈汉代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2005等。
- 4) 刘跃进在《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中另提新说，他认为文学自觉始于宋齐，主要有三个方面作为标志：“文学独立一科”、“文笔的辨析”、“四声的发现”。
- 5) 陈冬梅，〈文学自觉始于先秦—以《诗经》的创作为例〉，《潍坊学院学报》第13卷第3期，2013。
- 6) 赵金平，〈“文学自觉”始于汉末魏初简论〉，《镇江高专学报》第30卷第1期，2017。
- 7) 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2005。

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情况,考察鲁迅的说法是否妥当。在此基础上,再对“曹丕的一个时代”的文学进行整体系统的认识和研究,争取对那个时期的文学状况进行更加系统全面的再认识。

II. 鲁迅“文学自觉”说之探讨

“文学自觉”这个说法首见于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1920),后收入他的《中国诗论史》一书中。他认为,汉末以前中国人都没有离开过道德论的文学观,所以不可能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倾向。因此他提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⁸⁾,并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理论依据。1927年9月,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再次使用了这一概念,认为曹丕反对寓训勉于诗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此后,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从未停息过。学者们就“文学自觉”的时间划定问题反复讨论,形成了“魏晋文学自觉说”和“汉代文学自觉说”两个主要派别,而到了新世纪,又有学者认为“文学自觉说”毕竟是个西化的概念,借用到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也许本身就不存在合理性。这样关于“文学自觉”的争论由单纯的时间划定问题上升到概念的争论上,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但是不管是关于建安文学及后来的魏晋六朝的文学研究,还是整部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又都离不开这个概念的介入。而与文学自觉的时间划定相比,概念的界定变得更加重要。那么,这里就有了两个问题:一,很多学者讲到“文学自觉”是个西化的概念,那么西方的“文学自觉”这一概念起于何时,发源于何派,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意思?二,鲁迅所讲的“文学自觉”又有什么具体的含义?只有先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才能明确文学自觉的概念,进而才能认识那个时代的文学特征。

8) 铃木虎雄著,许总译,《中国诗论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37页。

1. 所谓源自西方的“文学自觉”

笔者查找了相关的西方文学史和西方文学评论，并未找到“文学自觉”这一提法，因此可以判断“文学自觉”这一概念并不是西方本来就存在的文学术语，而是应该在西方文学理论影响下产生的概念。而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正是日本学者铃木虎雄，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到魏代时，文学开始了自觉的时代。文学逐渐离开了实用文学。而其自身的价值则被人们所认识。魏文帝曹丕在其所作《典论》中……这一论点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学自身的价值，而且在于指出了文学自身有永久的生命力。”⁹⁾

铃木的“文学自觉说”意指文学脱离了“实用性”，即摆脱了功利主义，开始追求自身的价值。而后来鲁迅所提及的曹丕的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的说法显然是继承了铃木虎雄的说法。

既然“文学自觉”并不是源出西方的文学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受到了哪些西方文学流派的影响呢？我们再看一下鲁迅的原话：

“……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¹⁰⁾

很显然，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把“文学自觉”的含义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基本划上了等号。那么“为艺术而艺术”究竟又是指什么呢？“为艺术而艺术”这个说法实则是艺术自主论。所谓艺术自主论，即主张艺术彻底自治，反对艺术之外的标准干涉艺术领域，提倡遁迹于象牙塔¹¹⁾。这一说法最先起源于法国，最早由法国作家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提出，他认为

9) 同上，37页。

10) 鲁迅，《鲁迅全集》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490-491页。

11) 韦勒克著，杨自伍译，《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四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556页。

“文学可以无视社会道德”，反对文学艺术反映社会问题，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其完美的形式，艺术家的任务在于表现形式美。之后得到诗人博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1821~1867)和英国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的响应，后经英国作家佩特(Walter Horatio Pater 1839~1894)在理论上系统化，波及全欧。“为艺术而艺术”论的意义在于维护艺术，抵制道德家的要求，拒绝国家或公众的所有审查，坚持艺术的傲然独立以及处理一切题材的权力。发展到后来，“为艺术而艺术”成为西方唯美主义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理论根源是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美学，也受到艾伦坡(Allen Poe, 1809~1849)观点的影响，这种思想在20世纪早期，曾被一些进步作家如俄国普希金和中国“五四”时期的作家所接受，用以反对文艺为封建社会政治服务。“五四”时期，在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文人学者发起的“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中，这一理论被迅速地接受并传播开来。他们接受了这样一些观念：文学创造者不应该含有功利目的进行创作。这种对艺术本体意义的强调，已经与传统的功利文学观大相径庭了。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文学自觉”的含义本来是指文学的创造不再含有功利的目的，文学应该彻底自治，维护文学本体的意义。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说文学不再是政治教化的附庸，从政治教化中脱离出来，成为为了纯粹的艺术的纯文学。这点与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所主张的脱离道德论的文学自觉是相一致的。

2. 鲁迅的“文学自觉说”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鲁迅所言的“文学自觉”，我们再看看鲁迅先生的原话：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

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¹²⁾

从鲁迅的原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两个关键话语：一是“诗赋不必寓教训”，“为艺术而艺术”，结合上面我们的分析，也就是说文学应该脱离道德政治教化。二是“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结合鲁迅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知道，“近代的文学眼光”，就是指在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接受西方的学说理论，重新审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文学的眼光。在当时，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最重大的变化。下面来分别进行分析。

1) 文学与功利主义文学观

鲁迅所言及的“文学自觉”是指文学脱离道德论、政治教化，成为专门为了艺术的纯粹的文学。鲁迅沿用铃木虎雄的“文学自觉”的说法，从内涵上来说其本意与铃木虎雄的本意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对功利主义的文学观或者经学都是持否定态度的。但考察历史我们就能发现，中国古代的文学发展，正是以功利主义的文学作为起点的，由于中国人从先秦开始一直把“文”、“文章”看成是各种事物的外在表现，在“文”与“道”二者当中更看重的是“道”，所以在作文的问题上始终坚持“文以载道”的原则。中国人早就把先秦圣人之书推崇备至，并在认真研习经学的过程中，对于文学的认识被大大推进的。¹³⁾

那么从魏晋之后，中国的文学是不是摆脱了“功利主义”？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鲁迅提出其所主张的“文学自觉”的论证依据，即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鲁迅认为“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寓教训于诗赋的见解”，所以那个时代出现了“文学自觉”。对此，刘大杰之《魏晋文学思想论》也有类似的说法：

12) 鲁迅，《鲁迅全集》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490-491页。

13) 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2005，160页。

“他(曹丕)对于文学的对象,有离开六艺而注重纯文学的倾向……在这里看不到综经原道的意思,也没有班固那套正统的伦理观念,脱尽了儒学的桎梏……已有艺术至上主义的倾向,对于纯文学的发展,是要给予重大影响的。”¹⁴⁾

两种说法大意相同,就是曹丕时代的文学摆脱了儒家道德观念的束缚,从功利主义中脱离了,那么问题是曹丕是不是真的脱尽了儒学的桎梏呢?首先,曹丕这里所指的“文章”,并不是以诗赋为主的“文学”,而是“文章”,曹丕所言的“文”、“文章”,其内涵和外延与汉代是一样的,还没有像齐梁时期那样明确地区分“文”与“非文”。¹⁵⁾在曹丕所列出的八种文体中,在我们今天所看来属于文学范畴的诗赋两类,被排在了最后,自然曹丕所说的这句话并不是表示他把“文学”自身的价值看得很重要,更不用说是“为艺术而艺术”了。

我们再来看看铃木虎雄和鲁迅提出“文学自觉”的论据—曹丕的《典论·论文》,其中有一条说:

“余观贾谊《过秦论》,发古今之得失,通古今之制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¹⁶⁾

《过秦论》不是诗赋,正是曹丕所言的政论“文章”,是当之无愧的“经国大业”,所以,“经国之大业”的说法并没有超越汉代对文学价值的评价,从《典论·论文》中我们看不到曹丕反对“寓训勉于诗赋”的话¹⁷⁾,因此,鲁迅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用在曹丕身上都不合适,更不能代表曹丕的那个时代了。作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说:“夫文学也者,人伦之首,大教之本也。”¹⁸⁾,王粲把“文学”看作是“大教之本”,而作为建安文人的杰出代表曹植

14) 刘大杰,《魏晋文学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35页。

15) 赵建章、赵迎芳,《“文学自觉”时代的不“自觉”因素》,《人文杂志》第8期,2017,64页。

16) 曹丕,《典论·论文》,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商务印书馆,1999,83页。

17) 赵建章、赵迎芳,同上论文,63页。

也说：

“辞赋小道，顾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¹⁹⁾

可见，在曹植的心中，建功立业才是其终极追求的人生目标，辞赋只不过是“小道”。因此，不管是曹丕，曹植，还是七子来看，建安文学并没有实现“为艺术而艺术”，自然也不可能摆脱“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之后不管是陆机的《文赋》，还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最终所体现出的文学观均没有脱离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对于建安文学的创作实践，徐公持认为：“建安文学的主流，显然是积极用世的文学，是重视人事的文学，是修齐治平的文学”。²⁰⁾当然在建安文学后期的创作中的确出现了“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²¹⁾娱乐化、形式化的文学创作倾向—贵游文学，但那不是建安文学的主要特征，而且贵游文学并不被当时的理论所承认。

所以，魏晋文学并没有和教化脱离关系，如果和教化脱离关系了，那后来唐代的古文运动又该作何解释？其实，为教化服务未必不是文学，不为教化服务也未必是文学。文学为不为教化并不是决定文学自觉不自觉的决定因素。

2) 鲁迅“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的现代“纯文学”视域

鲁迅是在1927年7月在广州的演讲中提出“文学自觉”的，20世纪前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学遭遇到了西方文学理论的冲击，传统的古典文学观念让位给新的文学观念，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是

18) 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商务印书馆，1999，921页。

19) 曹植，《与杨祖德书》，郁贤皓，《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2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90页。

20)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9页。

21)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中西知识谱系的整体切换,是新知识取代旧知识,西学取代传统。²²⁾20世纪初,“魏晋文学自觉”、“为艺术而艺术”说的出现,实际上都是中国文学适应西方文学观念及学科分工的结果。中国传统经史子集不分,但是自19世纪中叶,受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的发展的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路线渐渐受到西方严密学科体系和科技文明成果的影响,这种影响自然也包括文学方面。如前所述²³⁾，“为艺术而艺术”的本质是文学脱离政教,成为纯文学。

中国文学观念长期以来在一个封闭自足的话语体系中生长,并未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而这正是古典视域与文学革命家的现代视域之间的最大区别。²⁴⁾鲁迅受西方近现代思想影响,他接受了“浪漫诗派”的文学观念,写作了《摩罗诗力说》,介绍评论了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1799~1837)、莱蒙托夫(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Лермонтов, 1814~1841)、裴多菲(Petőfi Sándor, 1823~1849)等多位浪漫派诗人。在对“文学是什么”这一有关文学本质问题的理解上,他和他同时代人一样,可以说明显受到西方文艺思想的影响。鲁迅对艺术的形式美感也非常重视,在《摩罗诗力说》中曾对文学的无用之用作了清楚的说明:“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回到文学本体,坚持文学的无用之用的娱心,实际上是一种“纯文学”的理论观念。鲁迅的“从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立足于现代“纯文学”视域之上审视中国古代文学,具有那个时代的激进的特点。这种激进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忽略了中国文学自身的特点和丰富性。

“纯文学”理论自上世纪二三十年形成以来,一直在影响着学者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认知,在研究古代文学中它本身就存在着先天的缺陷,而“文学

22) 黄念然、叶辉,〈鲁迅“文学自觉”说的现代性语境及其局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9卷 第一期, 2009, 170页。

23) 参看前半部分关于“所谓源自西方的文学自觉”的论述。

24) 黄念然、叶辉,同上论文, 169页。

自觉”的研究也是仍处在“纯文学”的范畴之内，关于“文学自觉”的各种说法不一恰恰表明了这种理论本身用于研究中国文学时的不适。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为艺术而艺术”从来就不是中国文学的主流，“文以载道”才是中国人对于文学的最基本要求，惟美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文学在多数时候都受到严厉的批评。文学功利主义与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主流的儒家思想一直都是紧密相连的，这构成了中国文学独特的发展主线，这是一个和西方不一样的“系统”，“为艺术而艺术”这种立足于“纯文学”视域之上的审美标准，评价标准，不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

现代以来，整个中国学术界都有一种用西方学术标准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格式化’的趋势，王齐洲先生在《中国文学观念论稿》中提到：“按照(胡适式的)新文学观念实在说不清楚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现象，更无法总结其规律，人们只能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一方面他们接受了新文学观念并努力加以贯彻；另一方面，又不能不顾及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而小心进行调整。由于受现成文学观念束缚，文学史学家们忽视了很多古代重要的文学思想和文学现象……文学史著作既没有也不可能创新文学观念，又没有也不能全面反映文学发展的真实历史。”²⁵⁾

综上所述，鲁迅当时提出的“文学自觉”是并没有考证史料，也没有经过严密的推理而得出的结论。通过考察鲁迅的本意，笔者认为鲁迅所提的“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说法欠妥。

III. 再看曹丕时代的文学

既然“文学自觉说”并不是概括建安文学的妥当的词语，那么这个时期的文学特征该怎么去评价呢？建安文学发迹于汉末魏初，处于上承“汉音”下启“魏响”的特殊时代，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建安文学所呈现出来的特征是复杂的、多样的。东汉末年，在黄巾起义的打击下，汉王

25) 王齐洲，《中国文学观念论稿》，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2页。

朝秩序崩溃，社会动乱，群雄并起，割据混战，儒学正统地位暂时减弱，处于回缩调整的状态。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在一种空前自由的社会环境下，文学领域产生了一些不同于前代的新的发展趋势。这个时期的文学从各个方面来看都出现了一派新的气象，呈现出一种转折的趋势：内容上由过去以“言志”为主，到这个时代转向“抒情”；文学作家们由两汉时代一种没有自由意志的“奴性”，到这个时期转为一种重视个人思想情感表达的“人性”；从文学自身来说，由过去经学的“附庸”，到这个时期转为文学意义上的“独立”。

1. 由“言志”到“抒情”

先秦的文学观是“诗言志”，“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诗大序》)《诗》在先秦时代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诗》是各国进行外交活动时必不可少的政治语言和交流载体，因此孔子才说：“不学诗，无以言”。到了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社会风气自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种风气影响到汉初，汉初的文学，也出现过抒情的先例，楚人入主中原，所带来的楚歌，形象生动，在感情的表达上显得淳朴真挚自然，如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虽然只有区区三句，却浑然一体，语言质朴，大气磅礴，包含了双重的思想感情，别具一格，当时能看到抒情的特点。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的正统独尊地位之后，“诗言志”的传统变成了“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伦理教条，“抒情”重新回归“言志”，并且影响日趋强化。因此总体来看，两汉的文学观可以概括为“言志”，而最能体现两汉人文学观的要数班固的《艺文志》：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言：“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

之后，周道衰坏，骋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意。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²⁶⁾

由此我们看出，两汉人对《诗》停留在敬畏经典的阶段，《诗》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和经典，屈原等“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所以才有“恻隐古诗之意”，楚辞在对文学作品的讽谏上，即“言志”这一点上与《诗经》有了共同点，才得到了承认。而从宋玉到杨子云，“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这与“诗言志”相偏离了，因此要受到批评，而汉乐府是“感于哀事，缘事而发”的，可以和《诗》一样，达到“观风俗、知厚薄”的作用，因此也是值得肯定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的文学观完全是以“言志”“风”作为衡量诗歌的标准，还处在先秦时代“诗言志”的窠臼之内。两汉400年，诗坛沉寂，士人将毕生的精力用于了皓首穷经的读经生活中去了，没有人能意识到可以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即使写作诗歌，也是和政治紧密相连的，要合于“诗言志”的传统观念。在这种大的观念下，几乎没有人能够逃脱出来。“只有到东汉末年社会大乱，儒学一统天下的格局被冲垮，其他思想才有可能迅猛的发展，尤其是‘庄’学的复兴，成为汉魏之际思想解放潮流的一面大旗……”²⁷⁾在这样的背景下，建安文学的创作呈现出由“言志”到“抒情”的创作方式的转变。建安诗人们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他们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具有强烈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感染力，和那种枯燥无味的说教和讽喻形成鲜明对比，显示出勃勃的生命力。《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所谓“以情纬文”，是说以抒情为基干来组织文章。抒情性的确是建安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²⁸⁾建安时期的五言诗和辞赋，抒情诗赋都占据主导地位，

26)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1755-1756页。

27) 李文初，《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91页。

一部分散文(主要是书、笺之类的作品)也呈现出抒情特色。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而聘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²⁹⁾开创了五言诗的伟大时代。钟嵘曾谈到过五言诗兴盛的原因，他认为四言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而五言诗则“指事造情，穷情写物，最为详切”。³⁰⁾五言诗发源于民间乐府歌谣，在抒情表达方面比四言诗优越，所以文人抒发自己的情怀的时候，五言句式是最好的选择，这类诗，象“公宴”类中曹植的《公宴诗》，应瑒《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咏史”类中王粲的《咏史》，“游览”类中曹丕的《芙蓉池作》，“赠答”类中刘祯的《赠五官中郎将》、《赠徐干》等，“乐府”类中曹操的《苦寒行》，“杂诗”类中曹丕的《杂诗》、《情诗》等等都是上作。

两汉时期占主要地位的辞赋都是叙事状物的大赋，其思想内容，或者对帝王歌功颂德，或者有所讽喻，都是直接为帝王服务的，到了建安时期情况有所不同，抒情咏物的小赋代替大赋占据了赋坛的主要地位，从文学价值上来看，抒情小赋比叙事大赋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在接下来的两晋南朝时期，这方面陆续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这也是辞赋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现象。建安文人的辞赋，内容多为抒情，也有一些咏物，篇幅一般都很短小。抒情赋的发展是这时期辞赋的一个突出现象。³¹⁾代表作品有祢衡《鹦鹉赋》、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均是此期辞赋的突出作品。

建安时期的散文，文学性增强，也出现了向抒情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主要见于《文选》的笺、书两类。内容多述朋友间的情谊，或述离情别绪，或悼亡伤逝，或追述昔日游乐，或品评文艺，大致都是讲日常生活中的情景和感想，颇能打动读者，具有抒情诗一样的风味与艺术感染力量。这种内容着重抒情，文辞美丽的散文，在过去是罕见的，从散文的历史发展上来看，这类抒情散文是建安散文的新面貌。这方面比较突出的作品是曹丕的《与朝歌

28) 王运熙，《建安文学的新面貌》，《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68页。

29)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30) 钟嵘，《诗品序》

31) 王运熙，同上论文，63页。

令吴质书》和《与吴质书》，抒情写景，真挚生动，文笔也委婉动人。建安散文的抒情化，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种现象。它标志着一部分散文摆脱了过去以记事说理为传统的传统，与“吟咏情性”，文辞欲丽的诗歌靠拢，文学性大大地增强了。³²⁾

2. 由“奴性”到“人性”

秦汉两朝，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新时期，秦朝短命，西汉王朝继秦而立，经过70多年的时间，经济恢复发展，中央集权国家空前强大，为适应政治经济的发展，在思想领域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定儒家于一尊的大一统局面，“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通，勿使并进。”³³⁾，董仲舒将儒家学说神学化以服务于巩固统一专制主义集权国家政权和绝对皇权。相应于经过董仲舒改造了的神学化的儒家学说统治地位的确立，在学术领域居于正宗支配地位的便是经学。“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³⁴⁾中央政权为加强自身专制统治的需要，诱以禄利，文人们也便趋之若鹜，专事经书的解说附会，以于求仕进。

当时的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学术思想的状况，而这一切，也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随着“独尊儒术”的确立，文人们对专事解经趋之若鹜，辞赋从形式到内容也变得迥然不同了。夸张的手法，华丽辞藻的堆砌，广事铺陈渲染，粉饰太平盛世，以表现其对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歌功颂德的思想内容。有的著述指出汉赋是典型的宫廷文学。李泽厚在其《美的历程》中认为：“在汉代，文学实际只是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这些专门的语言大师乃是皇帝的弄臣，处于‘倡优犬马之间’。”³⁵⁾木斋指出：“两汉

32) 王运熙，同上论文，66页。

33) 《汉书·董仲舒传》

34) 《汉书·儒林列传》

经术之下的文学，如同私塾腐儒严密管教下的学童，虽然有文学审美的天性，但不能不屈服于思想的牢笼，不能越雷池之半步，只能在歌功颂德的大赋中展现自己的华美，不仅不能说是自觉，反而应该说是一个经术枷锁的时代。”³⁶⁾因此，两汉时期的文学及文学家们不管是李泽厚所讲的“宫廷玩物”、“皇帝的弄臣”，还是木斋所言之“私塾腐儒严密管教下的学童”，都可以看出带有一种“奴性”，即被管教、被束缚的，没有自由被格式化的特征。

这种形势到了东汉末年，随着社会剧变，儒家传统社会地位动摇，文学上的思想解放和文学观念的发展，建安作家们从过去的文化枷锁中得以解放，能够面对广阔的现实生活，开始积极的人生思考，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观察社会，认识自我，建安作家们不再是“皇帝的弄臣”、“倡优”了。在创作的时候不再看皇帝的脸色，顺从皇帝的意志，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个性、愿望去大胆的创新。相对于过去的“奴性”，这个时期建安作家们的创作表现出“人性”的解放。刘师培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迨及建安，渐尚通脱，悦则侈陈哀乐，通则减藻玄思。”³⁷⁾文人的生命价值中心，从传统的经学氛围“奴性”意识中解放出来，渐次走向了追求个体生命的存在和愉悦。

首先从汉赋的发展来看，如果说在汉武帝之前还有贾谊的《鹏鸟赋》承接曲骚传统而表达出悲愤的激情，则司马相如之后的辞赋家，激情都被淹没在辞藻的海洋之中，淹没在长篇巨制的构建之中，成为没有个人情感的，没有灵魂的空壳。这个时代的辞赋家们赋体文学，汉赋的写作模式，不是写人，也不是以人的感情来写，无不体现着一种被束缚的“奴性”。反观建安时代的辞赋创作，规模趋小而抒情，体现出一种用“人性”感情来进行的创作。其次，我们可以从汉赋作家和建安作家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和运用上来看，典

35)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96页。

36) 木斋，〈论中国文学的三次自觉—以建安曹魏文学自觉为中心〉，《学术研究》第7期，2010，134页。

37)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7页。

型的汉赋如《上林》、《两京》对自然景物的铺张描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比兴手法只是把自然景物作为一种引发的工具，香草美人的寄托，只是比兴手法的引申，汉赋对于自然景物，多半只做纯客观的描写，未把客观自然景物作为独立的完美的审美对象去把握。而建安作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向我们展现的内容则完全不同：自然景物已经成为完整的审美对象，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体现出“对象化”和“人格化”的双向交构过程，体现了作家主体意识的充分发挥。³⁸⁾再次，建安作家们从单一的汉赋“奴性”创作中解脱出来，通脱自由地进行样式多样的创作，采用乐府诗样式，大量写作五言诗，开创七言诗，这个时期的文学家们开始追求表达人的主观感情，表现人的主体意识的文学，体现出“奴性”到“人性”的转折。

3. 由“附庸”到“独立”

从文学本体上来看，汉武帝之后，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文学被视为“雕虫篆刻”的娱乐品，沦为经学的附庸，被压抑在浓郁的经术范围之内，难有自己的独立的生存空间。两汉的哲学、文学、艺术以及文学批评，无一不在经学的思维模式的笼罩之中，在经学统治下，两汉诗歌也同样成为经学的附庸。两汉时间长达四百余年，诗人寥若晨星，诗歌作品更是凤毛麟角。文人穷毕生之精力，皓首穷经，致力于学术章句，少数士人写作文学，也都是模仿式的，而非创作式的。如司马迁所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³⁹⁾文学家同历史学家与天文历算家一样，为世俗所轻，他们的学问是不被列入正宗学术之林的。

到了建安时期，文学观念完全不同，“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长期，未若文章之无穷。”⁴⁰⁾这里

38) 张文勋，〈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建安文学评议〉，《云南教育学院学报》第2期，1990，7页。

39) 司马迁，《报任安书》

40) 曹丕，《典论·论文》，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商务印书馆，1999，83页。

的“文章”虽不等同于狭义的“文学”，但毕竟包括后来被列入文学的诗赋两类文体，也指的是文字的创作无疑。建安时期的文字创作，再也不是宫廷玩物，而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了，文字创作的地位既然如此重要，身为当时政治领袖和文学领袖的曹氏父子自然不再是汉时皇帝的弄臣，为流俗所轻，也不像乐府民歌的作者，是无名氏，而是“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酣歌，和墨以藉谈笑”、“雅好慷慨”⁴¹⁾的彬彬文士。他们创作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对皇帝歌功颂德和粉饰太平盛世，而是为了自己去创作。建安时期的文学创作，成了文士们自觉追求的对象，高尚的事业。曹操“雅好诗书文集，虽在军旅，手不释卷”。⁴²⁾刘勰谓“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横而聘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⁴³⁾文学活动成了他们生活与事功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位十分重要。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只有到了建安时代，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才真正独立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而立于学术之林，文学独立了。⁴⁴⁾文学创作有了独立的创作目的，相应的也出现了独立的文学批评的专门著述，曹丕的《典论·论文》就具有这样的历史地位，在《论文》中，曹丕对于“七子”文章的评论，不但能从时人的观点出发，以求实的态度，指出“七子”之各有所擅而又有所不擅，于所评论的对象，没有一味的或褒或贬，而是能够客观公正的做出评价。更重要的是，他能前所未有的肯定“文章”的社会功用，虽没有脱离“功利主义文学观”，但是也是前无古人地肯定了创作自身的独立的价值，肯定“文章”的地位，这种肯定既是当时文学独立在文学批评上的反映，又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进一步的推进作用。

41)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42) 《三国志·魏书》，卷二

43)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44) 苏风捷，《建安时代与建安文学》，《阜阳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1982，14页。

建安时期，从文学有了独立的地位(地位的独立)，建安文人把文学创作当成目标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文学创作目的的独立以及专门的文学批评的出现，即文学批评的独立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到了建安时期，文学出现了从两汉时期经学“附庸”到“独立”的转折。

IV. 结论

本文从学术界存在颇多争议的“文学自觉”问题入手，而驻足点则停留在再看建安时期文学的特点上。自鲁迅提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说法后，后人过多的发挥了这一说法，由于没有统一标准，学者们按照各自的理解，把鲁迅所提出的“文学自觉”理解为“人的自觉”，“文学审美标准的提出”，“文体的自觉”以及“文学作品的抒情化”等，因此围绕这一命题争论不止，对“曹丕的一个时代”即建安时代文学的理解也存在着混乱的状况。本人从鲁迅的原话出发，鲁迅把“文学的自觉的时代”描述成“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因此，本文从鲁迅先生提出解释“文学自觉”的两个关键词“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和“为艺术而艺术”入手，首先考察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源起和确切所指，得出“为艺术而艺术”这个说法实则是艺术自主论，即主张艺术彻底自治，反对艺术之外的标准干涉艺术领域，提倡遁迹于象牙塔，其意义在于维护艺术，抵制道德家的要求，拒绝国家或公众的所有审查，加之与首提这一说法的铃木虎雄的原意进行比较，之后鲁迅原话“他(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等综合考虑，我们可知鲁迅所谓的“文学自觉”的本意实则是指文学脱离道德教训，脱离功利主义，成为一种纯粹的文学。本文接着分析了中国文学与功利主义的关系，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是走的“文以载道”路线，根本从未从功利主义道德说教中脱离出来过。接着笔者分析了鲁迅的“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这个关键词，结合鲁迅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可以看出鲁迅是站在一种激进的“用现代的眼光看”的“纯文学”的视域的角度上提出“文学自觉”说的，这种说法是把西方的文学概念生搬硬套到中国古代文学

之上, 忽视了中国文学特有的发展规律, 并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文学独特的发展过程。因此综合以上两点得出结论, 鲁迅所言“曹丕的一个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的说法欠妥。

那么对建安时代该如何评价呢? 本文接下来对建安文学的特征进行了重新概括和总结, 对比汉代的文学情况, 到了建安时期, 由于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 军阀割据, 统一的汉帝国分崩离析, 儒家的大一统被破坏, 传统经学的桎梏被打破, 文学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前代的变化。内容上来看, 由过去以“言志”为主, 到这个时代转向“抒情”。五言诗的出现, 抒情小赋和抒情散文等文学作品的内容都出现了“抒情”的发展趋势。其次从文学作家们来看, 两汉时代的文学家们是一种没有相对自由意志的“奴性”状态, 到这个时期转变为一种重视个人思想情感表达的“人性”状态。最后从文学自身来说, 由过去经学的“附庸”、“宫廷的玩物”, 没有独立的地位, 到这个时期从地位、创作目的到文学评价都“独立”了。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来看, 这个时期的文学总体呈现出一种转折的态势, 因此本文认为“曹丕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转折时期。

<参考文献>

- 陈冬梅, 〈文学自觉始于先秦—以《诗经》的创作为例〉, 《潍坊学院学报》第3期, 2013.
- 陈萍, 〈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自觉管窥〉,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9.
- 陈平原,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程琳, 〈对建安文学的思考〉, 《时代文学》第10期, 2012.
- 杜红亮, 〈曹氏父子文学功用观与文学自觉〉,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8期, 2005.
- 龚克昌, 〈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 《文史哲》第5期, 1988.
- 龚克昌, 〈汉赋论〉, 《文史哲》第1期, 1981.

- 黄念然、叶辉,〈鲁迅“文学自觉”说的现代性语境及其局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9卷 第1期, 2009.
- 李炳海,《黄钟大吕之音—古代辞赋的文本阐释》,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 李飞跃,〈“文学自觉说”辩证〉,《中州学刊》 第1期, 2011.
- 李文初,〈从人的觉醒到“文学的自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文艺理论研究》 第2期, 1997.
- 李艳峰,〈“文学自觉”再思考—以诗、骚、赋为重点〉,《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第2卷, 2008.
-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 1981.
-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刘欢,〈汉代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期, 2005.
- 刘勰,《文心雕龙》,中华书局, 2012.
- 刘秀红,〈浅谈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文学教育》 第3期, 2009.
- 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 1994.
- 吕美生,〈论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3期, 1982.
- 鲁迅,《鲁迅全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 罗春娜,〈魏晋文化中“文学自觉”成因探究〉,《惠州学院学报》 第2期, 2011.
-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 木斋,〈论中国文学的三次自觉—以建安曹魏文学自觉为中心〉,《学术研究》 第7期, 2010.
- 苏风捷,〈建安时代与建安文学〉,《阜阳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4期, 1982.
- 田瑞文,〈“文学自觉说”的争论及其理论困惑〉,《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第2期, 2011.
- 王丽珍,〈略论建安文学的华美与壮大〉,《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 第2期, 2002.
- 王玫,〈建安文学在唐代的传播与接受〉,《厦门教育学院学报》 第5卷, 2003.

- 王巍,〈鲁迅论建安文学〉,《辽宁大学学报》第5期,1997.
- 王欣,〈魏晋文学自觉与文学场域的形成〉,《苏州大学学报》第2期,2009.
- 王运熙,〈论建安文学的新面貌〉,《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1979.
- 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魏宏灿,〈建安文人对建安文学的批评〉,《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2008.
- 魏宏灿,〈试论汉魏风骨与建安风力的关系〉,《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2001.
- 吴大顺,〈曹操“拟乐府”与建安风骨的发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2018.
- 吴云、张全生,〈建安文学研究述要〉,《天津师大学报》第2期,1988.
- 肖华荣,〈钟嵘论建安文学〉,《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1983.
- 邢培顺,〈建安文学“慷慨悲凉”风格形成原因再探析〉,《忻州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2011.
- 徐楚,〈试论建安文学中的生命主题〉,《楚雄师范学院学报》第10期,2016.
- 颜建华,〈“文气”说与建安文学特质〉,《安顺师专学报》第3期,2001.
- 杨冬晓,〈创作的自觉与理论的自觉—浅析关于“文学自觉”的争论〉,《文艺评论》第12期,2011.
- 杨颖,〈论“风骨”之外建安文学的另一风格趋向〉,《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2002.
- 俞灏敏,〈陆机与魏晋文学自觉的演进〉,《阴山学刊》第5期,2004.
- 袁行霁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詹福瑞,〈从汉代人屈原的批评看汉代文学的自觉〉,《文艺理论研究》第5期,2000.
- 詹福瑞,〈文士,经生的文士化与文学的自觉〉,《河北学刊》第4期,1998.
- 张谧,〈建安文学的真正领导人—曹丕〉,《沈阳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2000.

- 张少康, 〈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 《北京大学学报》 第2期, 1996.
- 张文勋, 〈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建安文学评议〉, 《云南教育学院学报》 第2期, 1990.
- 赵峰, 〈浅析刘勰对建安文学的研究〉, 《中共济南市党委校学报》, 第4期, 2012.
- 赵建章、赵迎芳, 〈“文学自觉”时代的不“自觉”因素〉, 《人文杂志》 第8期, 2017.
- 赵金平, 〈“文学自觉”始于汉末魏初简论〉, 《镇江高专学报》 第1期, 2017.
- 周涛, 〈我看建安文学兴起的文化根源〉, 《文史杂志》 第4期, 2004.
- 周振甫, 〈释“建安风骨”〉, 《文学评论》 第5期, 1983.
- 周振甫, 《诗品译注》, 中华书局, 2004.
- 문승용, 《중국 시가이론의 장을 연 건안문학론 연구》, 도서출판 다운샘, 2004.

< Abstract >

Since LuXun proposed that CaoPi's era could be regarded as a period of Consciousness of Literature, it has been a key expression to describe Jian'an Literature until many scholars raised their objections in recent years. Some scholars pointed out that “Consciousness of Literature” is an academic concept originating from the West which is not appropriate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urvey the literature of CaoPi's era again. This paper started from finding the concrete meaning of the concept which is so-called originating from the West, and then considered the meaning of LuXun's original words and the position of LuXun, we can ge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oncept of “Consciousness of Literature” is not appropriate to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ian'an Literature. On this basis, we re-examined the

Literature of CaoPi's era, in view of the concept, there has been a change from “Care of Statement” to “Lyrical Express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i writers, there has been a change from “Servility” to “Human nature”,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genre, there has been a change from “Vassal” to “Independence”. Therefore, from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the overall trend of literature in this period has turned into a turing trend. CaoPi's era can be seen as a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 曹丕的一个时代(CaoPi's era), 文学自觉(Consciousness of Literature), 功利主义文学观(Utilitarian literature), 现代纯文学视域(Modern pure literature), 转折(turning point)

